

The Consciousness Theory of Minority's Participation in Anti-poverty Subjectivity

MAO Yaping

Institute of Marxism, Kunming Metallurgy College, Kunming, Yunnan Province, China

838313033@qq.com

Keywords: Ethnic minorities, Poverty, Minority economy, Participate in.

Abstract. In the past, the government led the anti-poverty strategy of ethnic minorities, which did not give the minority groups full rights to participate. In fact, ethnic minorities have formed their own unique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in their own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are able to bear the consequences. If the long-term anti-poverty effect is to be achieved, the minority economy needs to be re-examined.

1.少数民族的反贫困问题

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并不只是包含消除贫困或改变落后这一层面的简单事情，而是一个涉及面极广的、带有错综复杂的现象和因果关系的社会问题。它需要包括政府官员、各领域专家学者和一般民众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关注来寻求解决问题的策略和途径。本民族内部成员如果没有经有效整合产生的共同的信仰系统，特别是如果缺乏文化层面上的高度整合，就很难谈及少数民族的发展。反贫困意味着引进和本土的结合与碰撞。要改变，要脱贫，必然就意味着某种程度的文化移入、文化冲击和随之而来的文化失调与重构。外来生产方式和生活观念的文化移入，如何能够以民族或区域传统文化的形成为依托，进而找到相互结合的触点，才能推动当地的发展。而这一切，都立足于当时当地少数民族这一基点之上。

发展是一种增强技能，同时降低脆弱性的过程。在反贫困的过程中，既要使农户认识到导致自身弱点的原因，也要找到增强自身能力的途径。因此，要充分考虑农户的脆弱性，因为对风险的惧怕会影响了农户的经济行为。强烈的风险或许会诱致穷人以牺牲市场导向的活动为代价，把他们的活动转向自给自足的生产，对穷人来说，出于安全需要，对更大获利机会的规避行为或许还是理性的。由于贫困者面临着相对更大的生存风险，而且只有较少的手段来对付这些风险，所以，使用自然资源方面也受到了限制。这些风险范围既包括对投入和产出市场的不适当的政策干预，也包括逐步形成的对有更强政治影响力的人更为有利的土地使用制度。对付危机的各种传统方法——出售储备的作物或货物、举家迁移、增加雇佣劳力、借钱购物、求助于互助传统往往都与穷人无缘，这意味着他们几乎没有什么选择，只能是过度地使用他们所能获得的任何自然资源。此外，贫困者通常都很难获得正式的信贷、保险，以及能够就减少风险的农业实践提供咨询的信息（例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因此，有效的反贫困政策要关注如何消除穷人的脆弱性。

在对待少数民族时，通常观点认为少数民族“落后的”消费行为抑制了经济发展。他们缺乏科学观念和商品意识导致了市场化和生产力水平低下，而且他们传统的价值观也不适应经济发展要求。而在讨论如何促使其发展时，政府和专家被认为能更客观地辨别在民族文化中那些是需要改进的“愚昧”、“保守”因素。而事实上，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建立最适宜于当地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关系及其相应的社会关系。从我国各地的贫困地区来看，适宜于当地生产力水平的社会关系具体类型是不同的。由此也产生了适合于不同地域特征的发展模式。少数民族不但应该在全球市场经济中有自己的地位，而且完全有可能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因为少数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独特，所拥有的资源有特色，所延承的文化有个性，注定他们可以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参与全球现代化。如果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要能够发展，文化又

能要得以延承，那么，经济发展就必须以地区少数民族为主体。只有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发展，才能维护民族文化的整体性。少数民族在以社会标准衡量处于贫困状态的时候，他们也仍然以特有的方式表达着自身的存在性。

当前的各种反贫困方式，习惯于用同样的模式去改造少数民族文化，而尊重和肯定的行为不足。尤其是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完整性和自在自为的活跃性等方面，还未给予充分认识，并且在它还未充分地展示前，就去否定和改变它。而实际上正是基于自己不同的文化个性，才使得各个少数民族均具有各异的经济社会形态和生存方式。民族经济是民族性的经济表达方式。但是在现代化理论下，知识被看作了一种商品，这种商品有明确的边界，可以被识别和转移，也被打上了等级烙印。因此在现实中，人们一方面对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行为和文化表示“鄙夷”，另一方面也意识到这些民族内在的品质即使在强大的外力援助和冲击下，仍然左右着民族发展的方向。为此，不论何种反贫困方式，都需要尊重当地人的文化、只有内在的参与动力和外反贫困推力的共同作用，才能取得长效发展。

2.对少数民族经济的理解

多样性的民族经济形态，在历史和社会的变迁中，赋予了其独特的经济符号，也由此衍生了文化、政治等一系列稳定的上层建筑结构。可以这样肯定：少数民族能够以商品社会中的成功的生产者和体面的消费者，而不是被救助者这样的姿态参与新时期的社会交融。

民族经济甚至没有什么一定的“经济增长点”或“支柱”型产业，而是以最微小的经济行为进行自我调控，它面对的市场也不是规律和既存的，其活动依据是灵活地进行生产经营，甚至都没有最基本经济规划。而实际上少数民族既在他自己的经济发展中受益，也有能力承担相应得后果。他们不是附庸或旁观者。与此相反，即使在被世人视为“落后”的今天，他也以自己独有的状态引起他者关注，并且得到自身发展的资源。

在肯定少数民族群体具有主动性也具有理性品质的基础上再来反思当前的反贫困问题，就赋予了不同的利益主体新的角色和权责边界。反贫困实践中，各主体是平等和互动的，而不是单纯地将某一民族无条件地囊括进多元一体性民族国家。要实现发展的积极目标，就要在这个过程中使受益人始终真正地参与到发展项目的决策、评估、选择、实施、管理等每一个环节。征求他们的意见、建议，利用他们的知识、经验，引导他们对社区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和努力，培养其责任感。在资源的管理和使用上要时受益人享有一定权力，并能够从项目中分享利益，从而使他们充分认同并接受发展决策的选择，把发展当成是自己的发展承诺，并把所有外部信息、技术及资金等支持变成自己内源的发展动力。

3.少数民族反贫困的技术参与

贫困群体利用资源的知识体系与技术是与其传统的山地农牧业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也是他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技能。当他们的生存与发展面临严重挑战，而传统的知识和技能无法解决面对的问题和困难，以及无法寻找到有效的生产技术前，他们唯一能够采取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依然是依靠其传统的生产方式及其技术与环境抗衡，或者是外出打工等方式。但是，带来的后果仍然是无法实质性地解决其面临地生存与环境的问题和挑战，仍然只能靠降低生活标准和生活质量来维持这种传统的生产方式和利用资源的技术。

农业部门中自然资源禀赋、自然灾害、农民的生育行为、文化特征和制度安排等都不是决定农业状况的基本因素。而导致传统农业停滞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收益低下。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能增加储蓄和投资，也无法打破农业这种长期停滞的“特殊类型的均衡状态”。因此，传统农业的改造出路在于寻找一种新的生产要素作为廉价的经济增长源泉。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是打破农业长期形成的经济平衡的最强有力手段。而最有效的提高农业效率的生产要素就是技术进步。学习和改变意味着外来的文化移入、文化冲击以及与之相随的文化失调

与重构。外来生产技术与生活方式的文化移入，若能以当地的环境、生态和传统文化为依托，进而找到结合的聚合点，实现技术引进与本土的结合，就能增强当地人的自身能力，并进而转化为反贫困的内在驱动力，实现其自由。尤其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托于人力资本优势。不同的劳动者素质会产生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形成各异的经济成果。

人力资本的投资实质上是将货币或财富转换为人的固有知识和能力形态，使人力与其他物品一样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反贫困强调贫困主体的参与能力，就是要使贫困群体能够有效地把握和利用提供给他们的机会，就要重视通过教育投资。教育的投资和积累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样也是长期和潜移默化的。

教育作为一种长期的人力资本投资，需要较长的时间周期和资金投入。而对业已成年的贫困人群而言，科学技术培训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提高人力资本素质。基础设施对技术传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反贫困措施的技术推广过程中，技术人员对当地人接受水平的无奈和农户对新技术的冷漠形成了鲜明对比。新技术推广不成功，并不是因为各方缺少科学技术知识，而是因为缺乏运用知识的智慧教育的实质是传授价值准则。但是价值准则也只有变成或者称之为内化成自己的一部分才能帮助我们选择生活的道路。也就是说，这些准则不是生硬的公式或教条，而应该是我们思考和感受的工具，观察世界、解释世界和体验世界的工具。在技术推广过程中，除了强调与本土知识的结合外，还需要考虑农户对新技术接受的心理承受力，虽然其经济行为有理性，但长期封闭的环境，使其受传统观念和传统经验影响较深，勉强糊口的生活状态对风险承担力低，从而对接受新技术有心理阻力。而且分散的环境又阻碍了强制性模式的技术扩散速度。技术的吸收同样需要较长时间。

进而言之，如果能让知识成为穷人头脑的一部分，技术的推广只能走“中间技术”路线。中间技术是介于发达技术和落后技术之间的一种状态，这种中间技术与本土的落后技术相比，生产率高很多，与现代工业的资本密集型高技术又便宜得多，它不仅在财力方面，而且在穷人的教育、才能、组织能力等方面都是力所能及的。之所以要寻求到这种中间技术，源于技术人员和当地人之间所具备的不同知识体系和结构。

技术人员具有的是“现代知识体系”，习惯于用科学逻辑和科学标准来研究、操作，某种意义上其成果是规范、封闭的实验室产物，无需过多考察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等变量。而对于当地人而言，现实的知识构成使其往往不具备这种逻辑思维能力，也不习惯于这样的科学规范的操作过程。农户在决策中，要考虑技术可操作性、风险性、获利水平等现实因素，因此，期待农户能够按照技术人员要求进行规范化操作是不现实的。而且，技术人员强调技术的科学性、理性并且依赖于统计分析实现技术测评，而农户的生产理性——乡土知识的运用，是其在生产实践过程中总结出来并且世代相传的适应自身农事系统特点的技术，代表了农户的技术需求和愿望。他们往往希望能够在原有的乡土知识基础上实现技术的拓展和创新，而不是全盘抛弃。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源发挥了重要的内生作用。但是，二者并不会在市场中自然产生，国家应起某种刺激作用。这是因为，私人投资技术开发和人力资源可能无法完全获益，需要政府支付成本；另一方面，如果研究开发的成果很快就转变为公共成果的话，也会挫伤企业积极性，政府的介入可以保护专利和知识产权。此外，由于人力资本形成存在诸如信息不对称、文化、宗教等不利影响，政府也需实施必要干预。通过教育和技术来改变贫困，需要肯定当地少数民族的既有知识和人力资本潜力，在此基础上实现外来成果与本土的有效结合，才能将外在推动力转化为内在驱动力，切实改变贫困。

4. 结语

参与式发展意味着少数民族不单是被扶持的对象，他们也是左右反贫困效果的利益主体。参与式扶贫大多以多边、双边及非政府组织合作的国际项目来开展，是一套以当地贫困人口

和贫困户为核心和主体的扶贫理念。其要点是建立“伙伴”关系，重视过程而不只是结果。它要求综合提高人的能力，重视乡土知识和群众的技术与技能、制度化。利用当地人的知识、经验，引导他们对社区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与努力，培养他们对发展的责任感和认同感。

References

- [1] E. F. Schumacher, *the Small Is the Beautiful*, translated by Yu hongjun and others, Commercial Press Edition, pp. 125-128, 1984.
- [2] Theodore w. Schultz,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trans. Liang xiaomin, Commercial Press, Preface Page 4, 1987.
- [3] Wang Sangui et al. *Technology diffusio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China agricultural press, pp. 90-100, 1998.